

中国辞书历史发展的若干走势^①

李宇明¹, 王东海²

(1.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, 北京 100083; 2.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, 山东 烟台 264039)

摘要:本文首先回忆了刘叔新、张志毅在辞书编纂、辞书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;接着讨论中国辞书史上发生的三大转变,即辞书编纂由个人独作到团队合作,政府角色由颁行者到引导者,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向学者背景;然后指出当下辞书发展的目标是建设优质辞书与数据库,学术目标是出理论、出人才,社会目标是发挥好辞书的存储集体记忆、社会知识服务的功能;最后讨论融媒体时代的特点是各媒体的迭代而存、信息传递的碎片化及其交互性,而所谓“融媒辞书”,本质就是跨界关联,是不同媒体的融合、编纂者与用户之间的融合、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。由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发展,也可以看作中国辞书史正在发生的第四大转变。

关键词:辞书;刘叔新;张志毅;融媒辞书;跨界关联;历史走势

中图分类号:H06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8039(2020)01-0001-06

中国辞书学研究和辞书事业的发展,不仅要借鉴国外辞书及辞书学发展的经验,而且更要总结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,萃取中国的历史智慧。第七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,主题之一是探讨刘叔新、张志毅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,这也是探讨中国辞书学经验的一部分。本文从两位先生的辞书研究成就谈起,论及中国辞书史的若干走势,直到当前的“融媒辞书”和辞书生活。

一、刘叔新、张志毅先生的“辞书人精神”

张志毅先生已仙逝五年,刘叔新先生辞世也有三年。在此期间,我们痛惜两位先贤的逝世,又庆幸两位学果长青,泽被后世。两位先生的词汇学词典学研究虽各有所侧重,但也经常紧密呼应,互相支撑,共谱学界佳话。

(一)两位先生的辞书编纂实践

词义的认知、概括、分析、描写等,都有较强的主观性,释义是词典编纂的高难度动作。同义词词典编纂,要在普通词典释义基础上再比同求异,准确描绘词义差异,这是词义的高层次加工。因此,同义词词典编纂一直是词典编纂的皇冠明珠。

1987年,刘叔新先生主编的《现代汉语同义

词词典》出版,这是一部按照刘氏同义词理论编纂的词典,词义辨析细致,词义区别的说明清楚,曾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
1981年,张志毅先生的《简明同义词词典》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,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这部辞典的编纂,始于张先生的中学时代,其中有20年的沉寂期。1987年,日本出版了修订译本,取名《中国语同义语辞典》,说它是“学习和研究汉语必备的工具书”;中国学者说它是“为数极少的被译成外语的汉语书”。2005年,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张志毅先生的90万字的《新华同义词词典》,这代表着张先生同义词词典编纂的高峰。

除了同义词词典,两位先生还编纂或参编了大量辞书。1998年,刘叔新先生出版了《中学语文学习词典》;2009年,刘先生又与秦飙、朱天吉合作出版《疑难字简明字典》。张志毅先生更注重反义词词典的编纂,在这方面与夫人张庆云教授携手共进,1986年,夫妇二人在齐鲁书社出版《汉语反义词词典》,2003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《汉语反义词大词典》,200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

收稿日期:2019-09-08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百年汉语语文词典谱系的词典考古研究”(19BY015)

作者简介:李宇明(1955—),男,河南泌阳人,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、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;王东海(1971—),男,山东烟台人,文学博士,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。

①“第七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暨刘叔新、张志毅词汇学与词典学学术思想研讨会”2019年7月27—28日在鲁东大学召开。本文是在论坛报告的基础上扩充而成。

版《新华反义词词典》(中型本)。同时,张志毅先生还是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分卷主编。

(二)两位先生的辞书理论探求

两位先生不仅编写了数部优秀辞典,还建构起各具特色的词汇学、词典学理论体系,在学术上竖起了两面理论旗帜。早在1975年,刘叔新先生即与李行健先生合作出版《怎样使用词语》,该书后来更名为《词语的知识和运用》,数次印刷,印数高达20多万册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》,是刘叔新先生的成名作。1990年,刘先生《汉语描写词汇学》^[1]出版,是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。1994年作为“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”首批五本之一的《刘叔新自选集》出版。2006年出版《词汇研究》,该书为“20世纪词汇语义学丛书”之一。

张志毅先生在大学三年级时,汲取俄国与欧美的学术营养,完成《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》,这是同义词词典编纂方法的奠基性论文。1980年,他在《中国语文》发表了《同义词词典的编纂法的几个问题》,为同义词的辨析作了条分缕析的说明。在反义词词典理论方面,张先生夫妇连续发表《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》(《辞书研究》1988年3期)、《反义词词典的释义和举例》(《辞书研究》1988年3期)、《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》(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4期)等。1999年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的《现代语文学辞书的整体观》,是其词典学理论实现转折的标志。张志毅先生200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词汇语义学》^[2],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“研究生教学用书”。张志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又完成、出版了学术专著《理论词典学》^[3]。

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,既有学术上的共同旨趣和共同追求,又有辉映互补的各自特色,成为词汇学和词典学的两座丰碑。今天,弘扬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,切实走出我国的辞书强国之路,就是要总结学界、辞书业界的经验,探讨信息化时代辞书的发展变化,丰富国人的辞书生活。

二、中国辞书史上的三大转变

在钱剑夫^[4]、刘叶秋^[5]、雍和明等^[6]、王东海等^[7]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中,都涉及辞书编纂工作和编纂组织。我们提出汉语辞书历经萌芽期、发展期、完善期、转型期(低谷期)、繁荣期、二次转型期等阶段^[8]。在这些阶段中,辞书发生了

三大转变:辞书编纂由个人独作到团队合作;政府角色由颁行者到引导者;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向学者背景。

(一)由个人编纂到团队合作

古代辞书往往是一人之力,极少采用团队合作方式。如许慎独自纂《说文解字》用21年,扬雄利用各方人士来京机会作方言调查,用27年始成《方言》^①。即便是后人为辞书做二度注疏,也往往以一人之功,集数年乃成,如段玉裁治《说文解字注》,历时30年。

《玉篇》《类篇》的编纂,已见团队合作雏形^②。第一部楷书字典《玉篇》标为顾野王所著,但《梁书·萧子显传》所附《萧恺传》则有这样的记载:“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《玉篇》,太宗嫌烦其详略未当,以恺博学,于文字成善,使更与学士删改。”这一记载说明,《玉篇》是由萧恺和别人共同删改。萧恺为太学博士,具有政府背景。《类篇》旧题为司马光所撰,但据考证,是王洙、胡宿、张次立、范镇等人相继修纂的,书成之后,司马光接手整理,进献皇帝。《集韵》标明是丁度、宋祁等人所撰,但实际上是由司马光续纂完成。《集韵》也是对《广韵》陈、丘本的重修,所以《集韵》之成书与《玉篇》《类篇》相类,体现着编纂人员历时相续的特点。

这几部辞书体现着团队合作的萌芽,真正的共时团队合作的辞书是《康熙字典》。《康熙字典》虽然有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的基础,但其在收词立目、释义、检索体例等方面都有独自创造。当时清王朝召集30位学者集体编纂,总纂官张玉书、陈廷敬主持,字典署名张玉书、陈廷敬,即有了“主编”之职。同时,修纂官凌绍霄、史夔、周起渭、陈世儒等分工协作,历时6年,团队合作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由个人编纂到共时团队合作,是一巨大进步。其优越性之一是时间短。一部划时代的巨型辞书《康熙字典》仅用6年,一部106卷的《经籍纂诂》仅用8个月。后世虽有朱起凤历时30余年发愤著《辞通》的佳话,但已只是个例了。后来大型辞书编纂,如民国时期的《中华大字典》《辞源》《辞

^①据考证,《方言》现传本还是未定稿,后几篇当为调查词目表。

^②团队合作编纂的模式也许很早就已出现。据何九盈考证(见刘叶秋《中国字典史略》),《尔雅》的作者系齐鲁书生集体编纂完成,但现在还缺乏明确证据。

海》《国语辞典》等,新中国第一次辞书规划的重大标志性成果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,无一不是“大兵团”的团队合作。

优越性之二是提高辞书质量。个人的知识、见解总是有限的,哪怕是硕儒大家。个人修书出现的错谬,往往要靠后人的二度注疏、考订才能弥补。集体编纂将个体智慧转化为集体知识,整合转化得当便可扬长补短,避免许慎释“为”为“母猴”的错误。

优越性之三是提高辞书内容的覆盖面。一人之力,难对语言文字做全面描述。《康熙字典》收字、收词、收义、收例都达到了古代辞书的最大值^①。全书收字 47000 多个(具体字数有多种说法),比《字汇》多收 13000 多字,到 1914 年《中华大字典》出版前,《康熙字典》一直是我国收字最多的通行字典。而且,能将每字的不同义项都详细列举,每一义项的例句又尽量引用初见古籍。这些义项及书证的搜索、整理绝非一人所能胜任。中国古代辞书众多,但在内容分量上可与著名的《牛津词典》相媲美者只有《康熙字典》。

但团队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,如多人协作责任不清,难让每人都全心投入,这会导致共同编纂的辞书在体例及表达风格上常难统一,重复芜杂之处颇多,如《康熙字典》的书证、凡例有不少明显错误,后经王引之等学者的详细校勘、修订,错误才得以逐步减少。

(二)政府由颁行者到引导者

辞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出版物,从古至今其背后都有政府因素。古代辞书多为政府颁行,或是奉敕编修,或是编纂成书后进献皇帝再颁行全国(如《说文解字》等)。编写者的政府背景都十分明显,编写中都融入了政府意志。

作为辞书萌芽的字表《史籀篇》,据传是周宣王的太史——籀所作。秦始皇统一文字,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《仓颉篇》,赵高作《爰历篇》,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;李斯为丞相,赵高为宰相,胡毋敬官至中丞相,都是政府要员。《说文解字》作者许慎是五经博士,举孝廉,历任洹长、太尉阁祭酒。《方言》作者扬雄任给事黄门郎,后召为大夫。《释名》作者刘熙官至南安太守。《玉篇》的署名作者顾野王为太学博士、撰史博士,后官至黄门侍郎、光禄卿、知五礼事。《类篇》署名作者司马光在哲宗时被召为门下侍郎,进尚书左仆射。《康熙字典》的主编张玉书为文华殿大学士,陈廷敬

先后担任康熙帝师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《康熙字典》总修官等职。

古代韵书承担着语音沟通的任务,也是科举考试的遵循(如《礼部韵略》等),亦为治经之小学工具,而经学是维护政府统治的思想武器,因此韵书多纳入政府行为。如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的修订无一不是奉敕。

民国为推广国语,就有黎锦熙的《国音标准字汇》。新中国之初,辞书不合用,毛泽东、周恩来都非常关注《新华字典》的编纂,直接批示过意见。而“文革”之后,面对“大国小字典”的尴尬局面,相关部门开展过两次辞书规划:第一次重点是补数量,解决社会对语文辞书的急需;第二次重点是补类型空白,形成了 20 世纪 80、90 年代辞书编纂的空前繁荣。

从民国开始,政府对辞书的管理由颁布者逐渐发展为引导者,辞书的编纂出版业务由出版社负责,出版社在辞书生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。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语辞书、中华书局的古汉语辞书、外研社的双语辞书等,是辞书出版界的三大优势力量。再如,上海辞书出版社因承担《辞海》的编纂与修订而成为辞书重镇,湖北辞书出版社和四川辞书出版社因承担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纂、修订而成为字典出版的高地。为组织、编纂、出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《汉语大词典》,还成立了两大专门的出版社。这些辞书出版社,形成了当今辞书业的基本盘。

(三)编者身份由政府背景转向学者背景

古代辞书的编者多为政府背景,但是到了民国,随着政府角色的变化,编者的身份也相应变化。例如民国时《辞海》的舒新城团队、《辞源》的陆费逵团队、《国语辞典》的黎锦熙团队,基本上都是由专家学者组织。虽然有些人仍有各种政府背景,如黎锦熙有教育部背景,但编者团队已多是学者,而黎锦熙个人在这里的学者身份更重要一些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《新华字典》的魏建功团队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吕叔湘、丁声树、李荣团队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参与人员近 2000 人,核心人员是专家学者。《汉字大字典》已经形成多省区、多出版社专家学者、出版家联动运作的编纂模式,团队组织逐渐加大。这些知识工程不但诞生了大量经

^①《四声篇海》等书放开收录死字、僻字,其收字数量较多,但从辞书体例的典型性上无法与《康熙字典》相比。

典辞书,积累了“大兵团”管理协作经验,而且锻炼了辞书队伍,培养了大批辞书编纂人才。

三、辞书业发展的三大目标

当前,我国的辞书事业进入二次转型期,有三个显著特点:1. 随着中文国际教育、语言(文)教学的发展,各种学习型辞书将有新发展;2. 传统辞书向多媒体、融媒体的方向发展;3. 辞书市场呈现重视用户、追求利润两大焦点。海外六大英语词典家族(牛津、剑桥、朗曼、柯林斯、韦伯斯特、麦克米伦等出版社)以学习词典为代表的词典群已经体现出了成熟的产业化特点,汉语辞书也已经向语言产业^[9]的方向迈进。“用户导向”正在发挥愈来愈强大的作用。辞书事业的发展,要有目标。这目标可以从辞书事业发展、辞书学研究和对社会的文化影响等方面来考虑。

(一)辞书发展目标:优质辞书与数据库

在辞书事业发展的历史中,我国已经七大“强档辞书”: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七版)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三版)、《辞源》(第三版)、《辞海》(第七版)、《大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(二版已启动修订)、《汉语大字典》(已完成二版修订)。这七大强档辞书应更加经典化,争取在世界辞书强者之林中占据前沿地位。

在世界辞书的跑道上,有许多著名辞书领跑了半个多世纪,如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1989年2版,61万条词)、《德语大词典》(1965年,33卷)、《丹麦语大词典》(1956年,28卷)、《法律宝库》(1987年,16卷)、《韦氏新世纪英语词典》(1987年3版)、《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》(1965年,17卷)等;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《大拉鲁斯百科全书》《美国百科全书》《德国百科全书》等。这些辞书是标杆,既是学习的目标,亦是超越的目标。

我们曾提出^[10],中国语文辞书赶超的目标是:收词数量,义项的齐全及义项切分的颗粒度,释义的水平及语义特征的提取,例证或书证的丰满度等。百科辞书赶超的目标是:科学的前沿性,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,大中小条目的均衡性等。

辞书编纂必须有语料库的支撑。例如《牛津英语词典》编撰和收录新词主要依据“英国国家语料库”(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),并拥有4800万词汇并以每年近500万词汇递增的“牛津世界阅读项目”(Oxford World Reading Programme)。我国应该拿出超常力量建设权威数据

库,这个数据库应当是:上百亿海量字符;古今并重;多语体、多语域平衡;深加工的;站在科学前沿;子库有针对性等。没有这样的语料库,辞书编纂将根基不稳,步履艰难。

(二)学术目标:理论与人才

辞书大国不仅要有好的辞书,还要有发达的辞书学。辞书学的发达与否,主要看有无影响世界的理论。

当前,国际辞书界较为关注词典释义问题。其一,“词、物兼顾”的释义倾向。语义性词典以释词为主,适当兼容百科知识(物)。百科辞书以释物为主,适当兼容语文性。例如新版《简明牛津词典》对“水”的释义,就比较全面体现了这一倾向。其二,后结构主义的新分布理论。结构主义考察词义,主要是看词语在短语和句子中的分布,后结构主义的新分布理论,则是在海量平衡语料库中考察词语在语境、语域中的分布特点,从而解释其意义。这将大大补充乃至颠覆传统辞书的释义。

国际上的这种新趋向,我国的辞书学界必须认真关注。但是,我国也有悠久的辞书历史,创造了独特的辞书经验,而且当今的辞书实践正在向着“融媒辞书”的方向发展,这是在世界上最为领先的辞书实践。在如此的辞书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,在借鉴国际辞书学成果的同时,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发展好中国的辞书学,创造出蕴含着中国辞书经验、影响世界辞书学的理论。

辞书学的发展还表现在人才培养上。我国尚无辞书学的本科专业,研究人才一靠“学院”培养,靠硕士点、博士点来培养;二靠“实践”培养,在事业单位的辞书实践中来培养。此外,辞书学会的辞书培训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学院培养,有较好的学养,但要注意接触辞书事业的实践,学术的真谛是研究和解决事业发展中的问题,而不是书斋中的苦思冥想。事业单位的工作者了解事业发展的实际,但在学理方面会有欠缺。这两支人员要在相互尊重、相互合作交流中扬长补短,成长为一支既有厚重学术底蕴、又了解中国辞书发展实际的人才队伍。

(三)社会目标:存储集体记忆与社会知识服务

辞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构建民族与国家的“集体记忆”。一个共同体必有自己的集体记忆,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必须构建自己的集体记忆。辞书在构建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,从词条的选立、解释、配例到辞书的附录,以及辞书所使

用的语文工具与知识架构,都无不发挥着构建集体记忆的作用。辞书的审评除了技术规范之外,主要审评的就是辞书所体现的集体记忆问题。辞书不仅在构建集体记忆,而且也是集体记忆的存储库;用户通过词条查询,也是在潜移默化地接受集体记忆。由此可一言蔽之:辞书是集体记忆的建构者、存储者和传播者。

辞书也是由诸多词条构建的知识体系。语文辞书是语言文字的知识体系,专业辞书、百科辞书是某专业或百科的知识体系。这些知识体系既是民族和国家集体记忆,也承担着社会知识服务的重要任务。国无辞书,便无文化。特别是以中文为载体的辞书,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中华文化的显示器。一个语言拥有的词汇量,表征着这一语言及其所负载文化的蓬勃水平。每个词条都有一个“语言故事”,都有一个“文化故事”,甚至还有一个“编纂故事”。词典是词汇之仓,故事之库,亦是文化纵向传承、横向流传的载体,是知识索解之源。词典编纂是在梳理和诠释词汇,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,是知识的汇聚治理工程。

辞书要完成知识服务的社会重任,应当具有“全、新、便”等特点。首先是辞书的内容要全。辞书编纂要继承此前的辞书内容,总结国内外各学科的成果,更要注意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。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,是现代学术的肥沃“田野”。从互联网中获取语文知识、学科知识,并将其编辑入典。其次要新。平面媒体时代的辞书,因讲求规范权威而不能便捷反映时下的新现象,再版更新时间长也耽误许多新知入典,这是传统辞书活动必须补助的问题。此外就是要方便用户使用,首先是提供查检的方便,然后要考虑“精准投送”。

四、融媒辞书

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,世界已经进入融媒体、智媒体时代^[11-14]。辞书已经有多种媒体形式,多种运营模式,有的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^[15]。当前我国的辞书事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节点上,由平面辞书向融合辞书发展。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之一是:线上辞书缺乏足够的权威性;平面媒体辞书有权威,但已经不是“首查”“常查”之辞书。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,在于发展融媒辞书,在于线上线下有机结合。

(一)融媒体与辞书

融媒体时代,传统媒体的优势与新媒体的特点融合起来,互补长短,“好用+有用”便如虎添翼,成为“飞虎”。融媒体的特点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。

1. 各种媒体迭代而存。平面媒体、有声媒体、网络媒体等新老媒体之间的关系,往往不是“取代”关系,而是“迭代”关系,在同一时间、同一空间中,各种媒体并存共生,各展其长。这些并存共生的新旧媒体,不是孤立存在,“你是你,我是我”;而是相互“关联”,相互融合,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;深度融合后甚至是“你就是我,我就是你”。

2. 碎片化。信息时代,接受信息、思考问题等主要用碎片化的时间,比如用开车的时间听广播,在地铁上读网络书等。这要求信息的传递方式也必须碎片化。接受信息的碎片化,信息传递的碎片化,成为新时代交际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3. 交互性。传统媒体也讲究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,“读者来信”就是。但传统的交互方式时间较长,也不是媒体的重要任务,顶多体现媒体的读者服务精神。现代媒体讲究的是方便快捷的交互。交互有“即时交互”和“异时交互”,“即时交互”是点对点的同时交互,比如微信电话、远程视频等;“异时交互”是发信者和接受者不必同时对话,发信者发出信息,接受者延时回馈。微信、留言就是异时交互。异时交互的信息传递更自由,也给接受者留下时间余地。就微信而言,一般多用文字方式,因为文字便于一目十行地阅读,可以快捷地接受信息。但是发信人就辛苦些。发信人还常用一些表情符号,以便把信息发送得快捷、直观。“交互性”对媒体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。当媒体与读者的交互达到一定程度时,就可能分不清谁是信息的发送者,谁是信息的接收者,“信息角色”会发生重大转化,信息的发送者、接受者角色互换。

4. 交互“红利”。媒体与读者之间,传统上通过赠阅报纸、杂志等方式来鼓励读者的参与;现代媒体与读者之间更是重视交互“红利”。比如网络游戏到某一级就配备上新装备,力量大增;学习强国 APP 积分,也有激励性。APP 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也引进了字词游戏,进行红利激励。这种交互红利有短时性、激励性和可“存储性”等三个特点。

(二)跨界关联

融媒体的以上特点正在改变传统辞书,形成“融媒辞书”。融媒辞书改变了辞书的组织方式、表现方式和使用方式,其最大的特点是“跨界关联”。

1. 不同媒体的融合。融媒体是新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。媒体融合的理念自1983年提出,已有36年历史。现在多数人对“融媒体”的看法,仍然是“全媒体”的,即:把所有的媒体集中容合。“容合”是物理的加合,“融合”是化学的“化合”。把平面媒体、有声媒体、网络媒体、自媒体等集中起来,不算融合,只能算是“多媒体”或“全媒体”;只有融合起来,才能叫“融媒体”。融媒体的关键是“融”,是把传统传播方式纳入“互联网+”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域中。传统媒体拥有丰富而权威的内容,有优秀的记者和新闻守门人,新媒体有高超的互联网技术,合乎青年人的阅读习性。把权威内容与高超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,融合起来,形成媒体内容的全新的生产方式、组织方式、表现方式和使用方式。

2. 编纂者与用户之间的融合。用户是辞书生活的核心角色,辞书生活的核心理念应是一切为了辞书用户。要深入了解用户在今天的辞书需求和检索习惯,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用户的辞书需求,支持现代用户的检索习惯。并根据用户的辞书需求和检索习惯,改良辞书编纂,改良辞书检索功能,改良辞书模样,改良辞书的出版发行。

重视用户使用辞书的数据,了解不同用户的使用特点,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。用户可以对词条提出各种意见,这些意见有些可以成为词典的补充,这样的情况多了,读者也就具有了编者的身份。编者与读者的身份也就逐渐融合了。

3. 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

融媒辞书不只是技术上的发展,更是各种资源的融合运用。比如文字内容与技术资源融合,加入音频、视频、动画、图形、图像、虚拟现实(VR)、增强现实(AR)等之后,会出现一系列的创新,如用新呈现形式、编码形式辅助或取代传统文本形式,如与“可穿戴(随身随用性)”电子产品结合。

也可以探索辞书资源之间的融合,形成“辞书联盟”,读者可以从一个入口,查得多部甚至是全部辞书的知识支持。甚至也可以探讨辞书与其他电子著作、数据库的关联,形成庞大的“知识联合体”。

五、结语

辞书构建、存贮、传播着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,辞书整理着民族及人类的知识,是极为重要的

社会知识服务体系。我国是辞书的古老国度,历史上编纂了大量的辞书,编纂的方式也与时嬗变,积淀了大量的辞书经验。而今出版业正在进入融媒体时代,知识的负载方式、传播方式、使用方式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

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,我国的“辞书生活”已经逐步成形,与“语言生活”^[16]互映。中国的辞书业面临机遇与挑战,中国的辞书学面临着崭新的研究课题,出现了巨大的学术创造空间。如何总结国内外辞书业和辞书学经验,定义“融媒辞书”,攀登“融媒时代”制高点,让国人过好智能时代的辞书生活,是中国辞书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叔新. 汉语描写词汇学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.
 - [2] 张志毅,张庆云. 词汇语义学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.
 - [3] 张志毅,张庆云. 理论词典学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.
 - [4] 钱剑夫.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6.
 - [5] 刘叶秋. 中国字典史略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2.
 - [6] 雍和明,等. 中国辞典史论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 - [7] 王东海,王丽英. 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3.
 - [8] 王东海. 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研究[J]. 辞书研究,2013(3).
 - [9] 李宇明. 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[J]. 东方翻译,2016(4).
 - [10] 王东海,张晖,张志毅. 辞书强国梦正圆——谈新辞书规划的推进措施[J]. 中国编辑,2014(5).
 - [11] 郭全中. 传统媒体转型的“一个中心”与“四个基本点”[J]. 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(12).
 - [12] 郭全中. 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[J]. 新闻与写作,2016(3).
 - [13] 柳竹. 国内关于“融媒体”的研究综述[J]. 传播与版权,2015(4).
 - [14] 栾轶玫,杨宏生. 从全媒体到融媒体:媒介融合理念嬗变研究[J]. 新闻爱好者,2017(9).
 - [15] 章宜华. 论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[J]. 语言战略研究,2019(6).
 - [16] 李宇明.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[J]. 语言战略研究,2016(3).
- (下转第13页)

